

The Prison Notebooks

狱中札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曹雷雨 姜丽 张跣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狱

中

札

记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曹雷雨 姜丽 张跣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狱中札记/(意)葛兰西(Gramsci, A.)著;曹雷雨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770-0
I. 狱… II. ①葛… ②曹… III. 葛兰西,A.-著作
IV. D354.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1091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 页 2
印 张 12.75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2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FFPS/22

总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费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

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

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

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生事物，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

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文化问题.....	(1)
第一节 知识界	(1)
知识界的形成	(1)
城市型和乡村型知识分子的地位差别	(9)
第二节 论教育	(18)
教育与文化的组织	(18)
寻求教育原则	(25)
第三节 意大利历史随笔	(34)
下层阶级的历史:方法论标准.....	(34)
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政治	
领导权问题	(37)
第一次复兴时期和国家结构中的城乡关系	(64)
温和派与知识分子	(74)
皮埃蒙特的职能	(75)
消极革命的概念	(77)
跋一	(84)
一篇有关柯罗齐的意大利史和欧洲史之论文	
的资料	(84)
第二章 政治随笔	(88)

第一节 现代君主	(88)
马基雅弗利政治学摘要	(88)
马基雅弗利和马克思	(96)
政治是一门自主的科学	(99)
政治要素	(107)
政党	(111)
世界观和实践立场:整体和部分	(120)
“经济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实践情况	(121)
预见和前途	(132)
国家的经济社团阶段	(136)
局势分析 力量关系	(138)
官僚阶级	(148)
固定比例定理	(152)
政府代表体制中的数与量	(154)
继承和传统	(157)
自发性和有意识的领导权	(158)
反对拜占庭主义	(162)
集体工人	(164)
自愿主义和社会民众	(165)
第二节 国家和市民社会	(167)
关于根本危机时期政党结构某些方面的认识	(167)
恺撒主义	(175)
海狸的寓言	(180)
煽动和政治宣传	(183)
“本世纪哲学”	(184)
政治斗争和战争	(185)
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机动战(前线出击)向阵地 战的转变	(194)

政治和军事科学.....	(195)
国际主义和国家政策.....	(196)
“集体人”或“墨守陈规”的问题.....	(198)
社会学和政治科学.....	(199)
霸权(市民社会)和权力的分离.....	(201)
法律意识.....	(202)
政治和宪法.....	(203)
议会和国家.....	(209)
自我批评和虚假的自我批评.....	(210)
国家.....	(212)
国内社会组织.....	(220)
谁是立法者.....	(221)
宗教、国家和政党	(222)
国家和政党.....	(222)
中央集权至上论.....	(223)
统治阶级的“美德”.....	(224)
历史纯文学.....	(225)
“颠覆分子”.....	(227)
“唯物主义浪潮”和“权威危机”.....	(230)
第三章 哲学研究	(232)
第一节 哲学研究	(232)
作为参考的一些初步观点.....	(232)
“常识”、宗教和哲学之间的联系	(235)
科学、宗教和常识之间的关系	(236)
哲学与历史问题.....	(25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诸问题	(293)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	(293)
对于一种通俗社会学尝试的批判性评注.....	(334)

一般性问题 (340)

译后记 (392)

第一章 历史文化问题

第一节 知识界

知识界的形成

知识界是一个自治而独立的社会集团呢，还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特殊而专门的知识分子范畴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形成不同知识分子范畴的真正历史进程所采用的形式各不相同。

这些形式中有两类至关重要：

1. 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资本主义企业家同自身一起创造出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人员。应该看到，企业家本身代表的是较高级的社会产物，其特点是具有某种管理和技术（即智识上的）能力：他不仅在其活动和进取的有限领域内，而且在其他领域至少是在那些最接近经济生产的领域，必须具有某种技术能力。他必须是群众的组织者；他又必须是组织起其业务的投资者、其产品的顾主等人给予他“信任”的人物。

如果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那么至少也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必须具有组织整个社会，包括所有复杂的服务机构以至于政府机构

的能力，这是因为有必要去创造最有利于扩大其所在阶级的条件；或者说他们至少必须具有选择代理人（特殊雇员）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把业务之外一般相互关系的组织活动委托给这些人。可以看到，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

即使是封建领主也拥有一种特殊的技术能力即军事能力，正是从贵族阶级丧失对技术—军事能力垄断的那一刻起，封建制度的危机便开始了。封建社会和它之前的古典社会中知识界的形成问题需要分别加以研究：必须具体地研究其形成和发展所遵循的途径。因此，应该看到，农民群众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其他社会集团正是从农民中间吸收了许多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传统知识分子中很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①

2. 然而，每个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并作为该结构发展之表现的“重要”社会集团，都发现（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知识分子范畴早已有之，而这的确好像代表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甚至未被最复杂和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所打断。

这些知识分子范畴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教士阶层，该阶层长期以来（在具有部分该垄断特征的整个历史阶段）垄断了许多重要的公共事业：宗教意识形态，即当时的哲学与科学，以及学校、教

① 在意大利南方更为显著。葛兰西的主要观点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教士、律师等等）一般不再有机地隶属于其出身的阶级。天主教会和劳动阶级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能够在阶级内部产生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始终属于该阶级。

育、道德、司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等。教士阶层可以看做是属于与有土地的贵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范畴。它在法律上享有与贵族同等的地位，可行使封建土地所有权，也可运用与资产相联系的国家特权。但是教士要行使在上层建筑领域所持有的垄断权并非不经过斗争，也并非是毫无限制的，因此其他范畴便以不同的形式（要具体地加以调查研究）产生了，而正是君主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致发展到专制主义，才促进了这些范畴的扩大。这样一来，我们便看到了具有自身特权的托加贵族的形成，行政管理等阶层的形成，以及科学家、理论家、非教士阶层的哲学家等等的形成。

这些不同的传统知识分子范畴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这种自我评价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不会没有影响，其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极易与知识分子社会群体所持的立场联系起来，被看做是社会乌托邦的体现，而知识分子以此自认为是“独立的”、自治的并且具有自我特性等等。

然而应当看到，如果教皇和教会的领导阶层自认为与基督和使徒之间的联系比同阿涅利和本尼两位元老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的话，那么秦梯利和柯罗齐也会如此，例如：柯罗齐感到自己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的联系尤为密切，但另一方面他并不隐瞒同阿涅利和本尼两位元老之间的联系，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柯罗齐哲学最显著的特征。

要接受“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其“最大”限度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用以平等地描述知识分子所有各不相同的活动，同时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活动呢？在我看来，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错误便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

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团体)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的确,例如工人或无产阶级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他们从事手工或使用工具的劳动,而在于他于特定的条件下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这种劳动(暂不考虑纯粹的体力劳动并不存在的说法,甚至泰勒所谓的“被驯化的猩猩”也只是用来表明某个方面之局限的隐喻:在任何体力劳动中,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由于其自身的职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智能,尽管他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是由这些能力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显著地标明他在企业内部地位的总体社会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当我们在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进行区分的时候,实际上所指的仅仅是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即考虑的是他们特定的职业活动是趋向于智力工作还是趋向于肌肉—神经的劳动。这就意味着,尽管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却不可说非知识分子,因为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甚至智力—脑力工作和肌肉—神经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没有变化,因此特定的智力活动便具有程度上的差别。能够将各种形式的智力参与排除在外的人类活动是不存在的:作为制造者的人(*homo faber*)不能和作为思想者的人(*homo sapiens*)分开。每个人最终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之外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也就是说,他是“哲学家”、艺术家和有品味的人,他持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一种有意识的道德行为,因而有助于支持或改造一种世界观,即有助于新的思想方式的形成。

因此,创造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在于对每个人以某种程度的发展所从事的知识分子活动进行批判的阐释,使知识分子活